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
关于学潮问题的论述

共青团吉林省委青运史研究室编

1989,11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 关于学潮问题的论述

最近一段时间内，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的闹事现象。有些坏分子不但不接受党和政府的负责人的引导、劝告、解释，并且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坐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

不但如此，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动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是我们能够允许的吗？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我们能够允许这种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吗？

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的所谓“社会改革”，也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他们公开声言，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四人帮”没有解决的那些“走资派”。他们中间有的人要求到外国去“政治避难，”有的人甚至秘密同蒋特机构发生联系，

策划破坏活动。

很明显，这些人就是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我们如果对这些严重现象熟视无睹，那我们的各级党政机关都只有被他们困扰得无法进行工作，还有什么可能考虑四个现代化？

这些事件诚然是极少数，并且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抵制，但是值得严重注意。第一，这些人一般都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很容易淆惑视听。第二，这些人利用林彪、“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很容易蒙蔽一部分目前有困难而政府一时还不能完全予以解决的群众。第三，这些人开始结成各种秘密的或者半公开的组织，一面在全国范围内互相串联，一面同台湾以及国外的政治力量相勾结。第四，这些人中还有一部分人同社会上的一些流氓组织以及“四人帮”的一些党羽相勾结，以扩大他们的破坏活动的范围。第五，这些人力图利用我们某些同志的这样或那样的不慎重的言论，作为他们的借口或护身符。以上的情况说明，同这些人的斗争不是很简单、短时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努力做好工作，把受他们蒙蔽的群众（其中许多是天真的青年）同这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分离开来，要按照法律，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进行严肃的处理。同时我们也必须教育全党同志务必注意提高警惕，照顾大局，在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既要继续解放思想，坚决发扬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又要努力克服一小部分群众特别是一小部分青年中间的思想混乱。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

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发现，一小撮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正在用“文化大革命”中的办法进行煽动和闹事，有些人甚至叫嚷什么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个别地方在坏人煽动下少数支边青年的闹事，极少数坏头头操纵的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积极串联，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公开发表，反动传单散发，政治谣言的传播，“四个帮”残余势力的活动，杀人放火、制造爆炸、抢劫偷窃、强奸轮奸等各种恶性案件的发生，走私漏税、投机倒把、行贿受贿、贪脏枉法等犯罪活动的滋长泛滥、泄露和出卖国家机密、违反规定滥发奖金、抬高物价、扰乱市场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不断出现，对这一切现象，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

尤其严重的是，对于这些不正确的观点、错误的思潮，甚至对于一些明目张胆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在报刊上以及党内生活中，都很少有人挺身而出进行严肃的思想斗争。最近一些与非法组织有关的人物特别活跃，他们假借种种名义放肆地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这种危险的信号，应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和全国青年的足够警惕！

（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

对于现在广大青年来说，有一种现实的危险，就是近期以来，全国一些地方非法刊物积极活动，扩大发行范围，并且纷纷要求注册登记，非法组织也重新抬头，都企图争取合法地位。所谓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就是指违反宪法和法律、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的刊物和组织。这些刊物在一些青年中散发、订阅，有一定的市场，其头头许多也就是非法组织的头头。有些非法组织，还力图在

一些青年中扩大和吸收成员。他们人数极少，但是是一种恶性的传染病菌。他们正在引诱、欺骗、蛊惑、煽动少数政治上幼稚的、没有经验的青年，以达到其险恶的政治目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1981年2月20日）

壁报、板报、校刊、学报和其它报刊，特别是各种全国性的报刊，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一律不准刊登煽动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不准转载非法刊物的文章。要认真对待青年人的来稿，并积极引导、培养、鼓励他们撰写思想健康、有学术或艺术价值的作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1981年2月20日）

党员、团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过去同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有过联系、对他们有过支持的，要如实向组织报告，并保证以后断绝一切联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1981年2月20日）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律不许以任何形式（例如向他们透露党和国家的机密，提供印刷、发行条件及活动的经费等）支持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或与他们保持暧昧关系甚至直接参与其活动。违者必须给予党纪、团纪、政纪、校纪处分。情节严重，经过教育坚持不改的，要开除其党籍、团籍、公职，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1981年2月20日）

我们完全相信，广大青年是热爱祖国的，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充分肯定这一点，都要支持和鼓励青年们的这种宝贵的政治热情。同时，也应当使青年们正确地认识到：不同的历史使命，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去实现。现在当然不能用当年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动政府压迫下搞救亡运动的那套办法来建设祖国。如果采取错误的方法，尽管用心是好的，结果也只会带来这样那样的混乱，或多或少地损害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分散全社会用于建设和改革的努力，也分散同学们用于追求知识的努力。

（薄一波在中顾委召开的纪念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1985年12月9日）

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凡是冲天安门的，要采取坚决措施。北京市既然公布了游行示威的规定，就是法律性质的，必须坚决执行，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前一段，我们对学生闹事，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影响了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疏导，包括法律的处理。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年12月30日）

最近，我们些有学生闹事。这次闹事的性质同前年“九·一八”时学生上街不同。我们正在处理这个问题。我们重视的不是仅占全国大学生百分之一多一点、不到百分之二的一小部分学生的闹事。问题不在这里，几个学生上街影响不了大局。问题在于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这是一个重大失误。我们要改变这种引导不力的软弱状态，要用我们自己的历史来教育青

年，也要揭露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因为他们这次的口号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旗帜鲜明。

（邓小平：《排除干扰，坚定地执行改革开放政策》，1987年1月13日）

最近我们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一是学生闹事，二是党的总书记更换。为什么学生会闹事？根本上是反映了我们领导上的软弱。我们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需要经常用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人民。

（邓小平：《加强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1987年1月20日）

大学生闹事，主要责任不在学生，而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其中主要是少数党内高级知识分子。我们严肃地处理了这件事。但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还没有结束，因为对于中国现在干的究竟是什么事情，有些人还没有搞清楚。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

（邓小平：《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1987年2月18日）

学生们闹一下的好处，是使我们更清楚了问题在哪里，这些年总的发展情况不错，国家情况好，人民生活逐步提高。学生们放假

回家，可以看到自己家里生活确实发生了变化，父母也要给他们上课的。所以，学生闹事这类问题对中国影响不会很大，更不会改变我们的现行方针和政策。至于我们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自己要求辞职，这与学生闹事这件事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一人事变动对我们的方针政策不会有任何影响，就是说我们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可能执行得更好。总之，我们是一切照旧干下去。学生闹事，使我们的决心更加强了。当然，也提醒我们要好好总结这几年的发展经验。

（邓小平：《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1987年2月18日）

这次闹事的学生多半是大学一二年级、二十岁以下的青年，他们没有社会实践经验。这次放寒假回去后，几乎每个家庭都给学生上了课。他们看看左邻右舍，同时又跑了一些地方，看到这几年搞的事情对每个家庭都有好处。所以，很多人回校后承认他们原来的认识和行动不对。

（邓小平：《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1987年3月3日）

当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教育的问题，同四个现代化建设将是平行的，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为了刹住一个时期的势头，例如对这次学生闹事，需要采取一些比较切实、紧迫的办法，但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50年至70年，在这50至70年内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既然是长期的事，不可能搞运动，只能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是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使我们能有

秩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1987年3月3日）

我们实行的民主不是搬用西方的民主。最近我同美国人谈话时讲过，中国只有坚持搞社会主义才有出路，搞资本主义没有出路。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这也不是今天才讲的，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在讲的，以后更要这样做。要用这个道理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这就是最近我们处理学生闹事的原则和方法。这类问题不但今天有，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中都会存在。

（邓小平：《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87年3月8日）

当然，对这次学生在游行中提出的我们工作中的问题，我们要重视。在我们国家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弊端，诸如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不正之风等，需要注意解决。因此，经济体制要改革，政治体制也要改革。

（邓小平：《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87年3月8日）

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使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是不行的，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那就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如果允许这部份人那部份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365天，天天都会有事。中国有中国的实际，这点我相信我们比国际朋友了解得多一

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社会主义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在强调发展民主的同时，要强调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要有理想、守纪律。

（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的谈话，1987年6月29日）

总的来说，中国人民是支持改革政策的，绝大多数学生是支持稳定的，他们知道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和开放。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美国有一二百年搞选举的经验。如果我们现在搞十亿人的选举，一定会出现与“文化大革命”一样的混乱局面。年轻人各执己见就会出现毛主席所说的那种“全面内战”。内战不一定需要枪炮，动拳头、木棒也行。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的谈话，1989年2月26日）

我们一直肯定大家的爱国热情、爱国愿望是好的，有很多事情是做得对的，提的很多意见也是我们政府希望解决的问题。我坦率地讲，你们对于解决这些问题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有些问题我们一直想解决，因为有许多阻力，未能及时解决。同学们很尖锐地提出了这些问题，能够帮助政府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这一点，我认为是积极的。但是，事态的发展不以你们的善良的愿望、良好的想象和爱国的热情为转移。事实上现在北京已出现秩序混乱，并且波及全国。……北京这几天，已经基本上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我希望同学们想一想，这样下去最后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对全国人民负责的政府，我们不能对这种现象置之不理。我们要保护广大同学的生命安全，要保护工

厂，保护社会主义的成果，保护我们的首都。这些话，你们愿意听也好，不愿意听也好，我很高兴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告诉大家。动乱，中国出现过很多次，原来很多人并不想搞动乱，但是最后发生了动乱。

（李鹏会见绝食请愿的学生代表时的讲话，人民日报，1989年5月19日）

我建议由中国和北京市的红十字会，负责把参加绝食的同学安全地送到各个医院去；我希望所有在广场上的其他同学予以协助和支持，这就是我的具体建议。同时，我要求北京市的和中央所属单位的各级医务人员，大力地抢救、护理参加绝食的同学，以保证他们生命的绝对安全。不管我们之间有多少共同点，或者还有什么不同点，现在救人是第一位的。在这方面，政府责无旁贷，有责任。每一个在广场上的同学也应该从关心同学的立场出发，予以协助。我这个要求，不是讲等到绝食的同学在生命垂危的时候再把他们送走，而是现在就把他们送到医院去。我已经发出指示，要求各大医院想一切办法，腾出床位和必要的医疗条件，接待这些绝食的同学。这些天来，我们广大医务人员也是非常辛苦的，他们夜以继日地、精心地护理绝食的同学。

（李鹏会见绝食请愿的学生代表时的讲话，人民日报，1989年5月19日）

现在是有一些机关的工作人员、市民、工人，甚至有我们国务院一些部门的人员上街游行，表示声援。我希望你们不要误解他们的意思，他们出于对你们的关心，是希望你们身体健康不要受到损害。但是这里面也有许多人的作法，我是不完全赞成的。如果他们劝你们吃点东西，喝点水，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劝你们尽快地离

开广场，有话好和政府来商量，这完全是正确的。但是，也有不少人是在那里鼓励你们继续绝食。我不能说他们动机怎么样，但是这样做，我是不赞成的。作为一个政府的总理，不能不表明我的态度。

（李鹏会见绝食请愿的学生代表时的讲话，人民日报，1989年5月19日）

我作为政府的总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今天不讲，我会在适当的机会来讲这个问题，而且我也差不多讲了我的观点。如果今天一味要在这个问题上来纠缠，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如果你们认为你们自己在座的这些同学，不能够左右你们伙伴们的行动，那我就通过你们向在广场上绝食的同学发出呼吁，希望他们尽快结束绝食，尽快到医院去接受治疗。我再次代表党和政府向他们表示亲切的慰问，衷心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政府对他们这一很简单、而且是很紧迫的要求。

（李鹏会见绝食请愿的学生代表时的讲话，人民日报，1989年5月19日）

我们的党和政府多次说过，广大青年学生的心灵是善良的，他们在主观愿望上是不想搞动乱的。他们有爱国热情，希望促进民主，整治腐败，这同党和政府要努力实现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和意见，已经对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起到积极作用。但是，任意采取游行、示威、罢课乃至绝食请愿等方式，破坏了社会稳定，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事态的发展已经完全不以青年学生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正在越来越走向他们愿望的反面。

（李鹏：《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社北京1989年5月19日电）

当前首都形势相当严峻。无政府状态越来越严重，法制和纪律

遭到破坏。本来，5月初以前，经过大量的工作，形势已趋于平稳，但进入5月以后，又更加动乱起来。卷入游行示威的学生和其他群众越来越多，许多高等学校陷于瘫痪，公共交通到处堵塞，党政领导机关受到冲击，社会治安恶化，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全市人民的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正常秩序。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中的一些国事活动安排，也因此而被迫变更或取消，极大地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

天安门广场部分学生绝食请愿的活动还在继续。他们的健康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有的人生命已处于危险之中。实际上这是少数人拿绝食同学作为“人质”，要挟、强迫党和政府答应他们的政治条件，连一点点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讲了。党和政府一方面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对绝食学生进行治疗和抢救；另一方面，多次同绝食学生代表进行对话，并郑重表示今后将继续听取他们的意见，希望立即停止绝食，但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在天安门广场人群拥挤，煽动性口号不断和人群情绪极度激动的情况下，绝食学生代表也表示，他们已不能控制局势。现在，我们如果再不迅速结束这种状况，听任其发展下去，很难预料不出现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情况。……种种情况表明，如果不迅速扭转局面，稳定局势，就会导致全国范围的大动乱。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和命运，已经面临严重的威胁。

（李鹏：《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社北京1989年5月19日电）

现在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极少数极少数的人要通过动乱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这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公开打出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目的就是要取得肆

无忌惮地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绝对自由。他们散布了大量谣言，攻击、污蔑、谩骂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现在已经集中地把矛头指向为我们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邓小平同志，其目的就是要从组织上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依法产生的人民政府，彻底否定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四出煽风点火，秘密串联，鼓动成立各种非法组织，强迫党和政府承认，就是要为他们在我国建立反对派、反对党打下基础。如果他们的目的得逞，什么改革开放，什么民主法制，什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将成为泡影，我国将出现一次历史的倒退。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就会变成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中国。

（李鹏：《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社北京1989年5月19日电）

现在，为了坚决制止动乱，迅速恢复秩序，我在这里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呼吁：

一、目前还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希望你们立即停止绝食，离开广场，接受治疗，尽快恢复健康。

二、广大同学和社会各界，希望你们立即停止一切游行活动，并从人道主义出发，再也不要对绝食学生进行所谓的“声援”了。不管动机如何，再搞“声援”就是把他们推向绝路。

……我们党是执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为了对神圣的祖国负责，对全体人民负责，我们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迅速结束动乱，维护党的领导，维护社会主义制度。

（李鹏：《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社北京1989年5月19日电）

我们所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揭露少数人的政治阴谋，一个

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广大青年学生同挑动动乱的极少数人区别开来，是出于对青年学生的爱护。前一段，我们在处理学潮问题上所以采取极其宽容、克制的态度，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愿望和目的，特别不要伤害青年学生。

（李鹏：《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社北京1989年5月19日电）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要坚持保护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把他们同制造动乱的极少数人严格区别开来，对他们在学潮中的过激言行不予追究。不但如此，党和政府同广大学生和各界人士之间的对话，包括同参加过游行、示威、罢课、绝食的学生之间的对话，还将通过多种层次、多种渠道和多种形式广泛积极地进行，以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对学生们提出的合理要求，我们将给予明确的答复，对他们提出的合理批评和建议，如惩治官倒、清除腐败、克服官僚主义，我们将认真听取和采纳，以切实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

（李鹏：《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社北京1989年5月19日电）

部队执行戒严任务是为了恢复首都的正常秩序，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绝不是针对学生来的。部队的同志决不愿意发生流血事件，并会采取一切措施来避免，请同学们不要听信谣言。希望同学们尽快返校复课，以理智态度协助政府平息事态。

（徐向前：《聂荣臻、徐向前答复中国科技大学部分学生》，新华社北京1989年5月21日电）

一、这四条纯属谣言，请同学们不要轻信；二、军队到北京来，实施戒严，完全是为了维护首都的社会秩序和安定。希望同学

们协助解放军做好这一工作；三、希望同学们为了国家尊严、首都的秩序、市民的生活、自己的健康和学习，能尽快撤离天安门广场。希望科大同学带个头，返校复课。

（聂荣臻：《聂荣臻、徐向前答复中国科技大学部分学生》，新华社北京1989年5月21日电）

亲爱的同学们、市民们，我恳切希望你们要相信党，相信人民政府，相信人民解放军。这次人民解放军奉命进驻北京是为了维护首都的社会秩序，保证大家有一个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我希望广大同学和市民给予大力支持。

希望广大同学尽快返回学校，恢复正常的学校生活。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以高度的爱国心和责任感，帮助党和政府以及人民解放军顺利完成恢复首都正常秩序的任务。

（《邓颖超写给首都同学市民的信》，北京日报，1989年5月22日）

这次学生游行的动机是好的、纯洁的、善良的、建设性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失误，把国家的事情、社会主义事业办得更好，这同我们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他们所采取的手段、方式不大妥当。这不怪孩子们。一是他们对法律不熟悉或不很熟悉。二是他们缺乏政治经验，对极少数报少数阴谋家、坏人乘机制造动乱的险恶用心，警惕不够。我们这些老同志有责任帮助他们，提醒他们。否则就对不起孩子们。

现在思想比较乱，有各式各样的口号，各式各样的看法、主张，各式各样的纲领等等，问题旷日持久得不到解决。思想怎么统一？我们有宪法和法律，应该也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来统一思想。不能再象“文化大革命”那样“和尚打伞、无

法无天”了。难道苦头还没吃够吗？还要让灾难重演吗？我这样说，决不是主张惩办无辜的学生和其它善良的人们，对他们不存在进行制裁的问题。至于对极少数极少数阴谋家、坏人，另当别论。解放军不是来对付学生的。……必须把煽动、制造动乱的极少数极少数人，和动机纯洁的学生及其它善良的人们严格区分开。

（彭真在部分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1989年5月26日）

参加游行示威、罢课、静坐的人大多数是年轻学生，还有其它方面人士。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的本意是好的，他们希望国家进步，要求政府清除腐败现象，他们的很多意见同党和政府是一致的，他们同党和政府之间没有根本矛盾。他们并不了解事情真相。一旦了解了，他们同党和政府在认识上的距离就会缩小。我对此充满信心。

（李鹏：《会见三国新任大使时谈中国形势》，新华社北京1989年5月25日电）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都必须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谁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有的人嘴上讲法制，实际上不仅自己践踏宪法和法律，还煽动别人违犯宪法和法律，请同学们和各界群众提高警惕。

（彭真在部分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1989年5月26日）

广大青年学生提出反对“官倒”，惩治腐败，促进民主，希望社会进步、国家富强，等等，愿望是好的，他们的许多要求也是合理的。我们工作中确实存在失误，我们的队伍中确实有腐败现象，我们的民主和法制建设确实需要加强，学生们的愿望和要求，也是